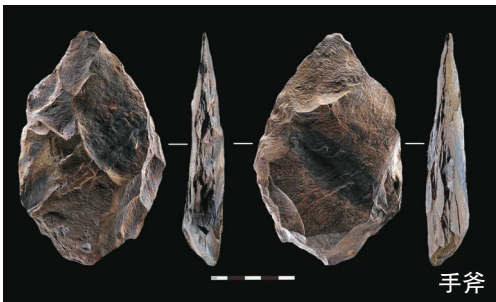


近400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亮相国博

——全面展示新时代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进步和辉煌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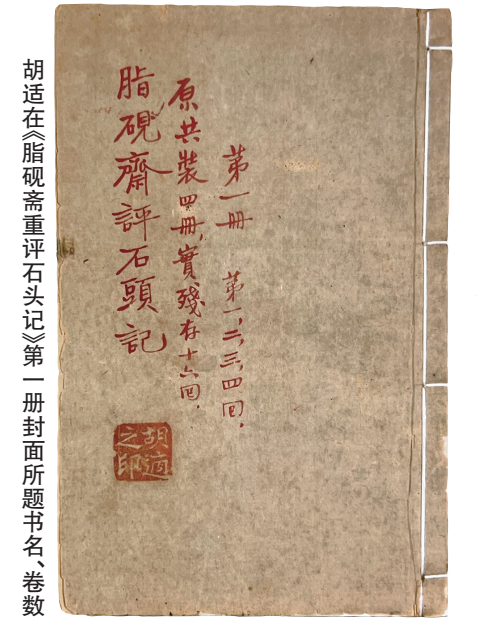
9月14日,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11家央地共建博物馆承办的“鉴往知远——新时代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2012年以来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重点,汇集展示了全国43家文博考古机构近400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时期,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从边疆考古到丝绸之路考古的多个领域,包括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等重大考古发现。

展览分为“走向文明”“协和万邦”“海宇攸同”“殊方共享”四个部分,生动讲述了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完整呈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重点文物介绍

手斧 旧石器时代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原料为角岩,形状呈标准水滴形。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创造并使用的重要工具,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定型工具。具有对称性、多功能性,兼具审美和实用功能,被考古学家称为“早期人类心灵之窗”,可用于切割、挖掘、砍伐等。



连体双人玉珎 新石器时代 石家河文化
2015年湖北天门谭家岭遗址9号瓮棺出土
天门市博物馆藏
左边头像为男性,右边头像为女性,头戴管帽,菱形眼,长发,为石家河文化所特有。

石雕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
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出土
辽宁考古博物馆藏
此像为黄褐色砂岩质,采用圆雕手法,面部形象清晰。头顶有冠带饰,垂向脑后。

龙纹禁 西周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3号墓出土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在宝鸡地区曾发现过两件铜禁,皆为戴家湾出土,一件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另一件现藏天津博物馆。3件铜禁在形制、纹饰方面相近,细部有所不同,时代大致相同。石鼓山3号墓出土的铜禁是唯一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禁,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青铜盒 春秋
山西垣曲北白鹤墓地出土
山西考古研究院藏
北白鹤发现的铜盒是同类器中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造型最丰富、样品保存最好的。检测表明,铜盒内的残留物是以油脂、植物精油、朱砂及方解石、霏石为主要成分的化妆品,是中国先秦时期化妆品应用的重要实物资料。

曾侯丙方缶 战国
湖北随州文峰塔18号墓出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器体方鼓,方盖,方口,方肩,方圈足,肩部对置兽首衔环。通体饰菱形勾连纹,内嵌绿松石。器盖内铸铭铭文“曾侯丙之赴缶”以为长事,“双耳铸铭文“曾侯赴缶”以为,表明了器主身份。

“华孟子”青铜鼎 春秋
山东沂水纪王岗1号墓出土
沂水县博物馆藏
腹内壁铭文5行27字:“华孟子作中殿氏妇中子腰孟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保用享”。意思是说,华孟子制作的这件大铜鼎,是为自己嫁给中殿氏的二女儿做陪嫁用的宝鼎,希望长寿万年没有尽头,子子孙孙永远享用。从铜鼎的用途来看,这是一件作陪嫁用的膳器。

铜杖首 战国至西汉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12号墓出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鸟对立站立在台座上。釜近圆柱体,中空,用来纳柄。权杖是一种身份、权威的象征,推测墓主人生前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莲花形铜烛台 辽代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鎏金鍍花人物银碗 北魏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1号墓出土
锡林郭勒博物馆藏
敞口,弧腹,圈底,底部有四个人物头像,口沿下有连珠纹一周。腹部伸展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将腹壁四等分,每一等分之间的小叶纹之上托着一个圆环,圆环内各捶揲一个人头像,头像皆侧身,高鼻深目,两两相对,三女一男。三女子相貌年轻,发式各不相同。男子中年相貌,头发较短,下颌蓄胡须。该碗与大同北魏墓群107号墓的鎏金刻花银碗、109号墓的鎏金鍍花高足银杯及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鍍花银碗的纹饰和风格基本相同。有学者认为属于萨珊波斯器形,也有人认为是萨珊波斯属国贵霜—萨珊王国的产品。

鍍指金杯 公元8世纪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出土
热水联合考古队暂存
敞口,圆唇,弧鼓腹,圈底,矮圈足。上腹有一道折棱,口部与折棱间装有一环形把手,把手上部有指垫,下部有指垫。折腹器这种形制是西方较为流行的器物造型,由此可见西方文化对青海地区的影响。

青釉弦纹三足炉 元代
江苏省太仓市樊村泾遗址出土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内折沿,直筒腹,矮圈足撑地,兽蹄形三足悬空,腹壁饰三道平行宽带状。施粉青釉,底内外无釉。这种筒式炉是宋至明代流行的一种炉式。此炉器型端庄秀巧,釉色莹润淡雅,恰合文人士大夫复古的追求以及崇尚清雅的艺术品位。瓷炉是常见的外销瓷器品种。

青釉弦纹三足炉 元代
江苏省太仓市樊村泾遗址出土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内折沿,直筒腹,矮圈足撑地,兽蹄形三足悬空,腹壁饰三道平行宽带状。施粉青釉,底内外无釉。这种筒式炉是宋至明代流行的一种炉式。此炉器型端庄秀巧,釉色莹润淡雅,恰合文人士大夫复古的追求以及崇尚清雅的艺术品位。瓷炉是常见的外销瓷器品种。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现藏何处

郑重

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都无法绕过脂砚斋,研究脂砚斋的人又无法绕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几种抄本。即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十九年,1754年)、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检阅《红楼梦》几个抄本的收藏情况,有这样的记载:甲戌本胡适旧藏,现藏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己卯本原董康藏,现藏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庚辰本原徐桢祥藏,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国内学者对己卯本、庚辰本都作了许多校勘研究,并有专著作出版。特别是己卯本,1955年由文学古籍刊行所影印出版,有着广泛的读者,而对“甲戌本”,只知其为胡适所藏,其他情况则知之甚少。

1927年,胡适是怎样购得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我们从胡适的著述中得知,当年他从国外回来,该书的收藏者胡星垣致信他,称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意转让,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胡适认为重评的《石头记》没有多大价值,就没有回信。这时,徐志摩、胡适、邵洵美联合开办新月书店的广告刊登出来。胡星垣即将此书送到新月书店,转交胡适。胡适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已经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当时对《红楼梦》有几种评论。一种评论认为《红楼梦》是为清世祖与董妃小宛而作。秦淮名妓董小宛为冒辟疆的小妾,被掠夺进京,受到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董妃死后,清世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这一派的代表作为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第二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是为明朝唱挽歌,其代表作为《石头记索隐》。还有一派的大致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这一派还是有些影响的。我在夏衍家看到纳兰成德写给张见阳的十多通信札的卷子,卷后有启功、叶恭绰的题跋,他们仍然认为《红楼梦》的贾宝玉写的就是纳兰成德。

1921年胡适著《〈红楼梦〉考证》,对上述三种评论都一一给予否定,提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书,“里面的真假两宝玉,既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由此,对《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称之为“新红学”。当时,鲁迅、钱玄同、茅盾、叶圣陶等都卷入了这场

争论。我当年访问顾颉刚时,顾先生和我谈当年他为胡适找材料,并在一起研究《红楼梦》的情景,并说他曾把一包稿子丢在黄包车上,是叶圣陶帮他找回来的。

胡适用几十万字对小说《红楼梦》考证,只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告诉人们怎样思考。当时有人批评《〈红楼梦〉考证》有些证据不足,胡适发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证明自己的假设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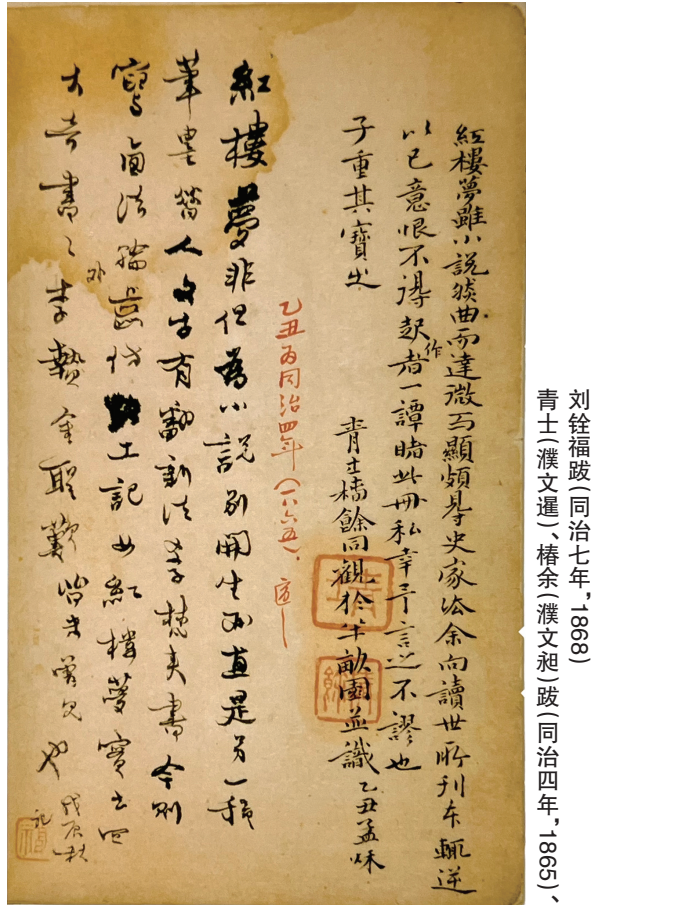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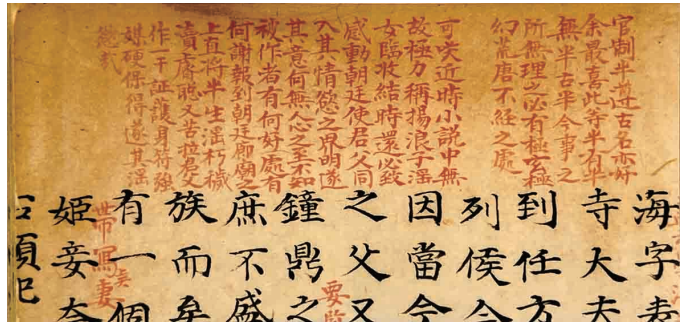
从1927年胡适购得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到1948年周汝昌借去抄了一个副本。在这20年里,除了胡适写了一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很少有人提及这个“甲戌本”,也很少人看到过。胡适于1948年离开北京去南京时,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就是“甲戌本”,周汝昌没说另一本是什么书。实际上是胡适父亲的遗著清抄本。胡适看到叶恭绰把祖父、父亲的诗词整理刊印,即给叶写信说自己没能把父亲的诗词刊印,心中感到愧疚。

胡适去了美国,即把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携去。从此,中国只有周汝昌传抄的副本。195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做了三套显微影片。一套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套赠给胡适,一套由胡适赠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后来,胡适把自己保留的显微影片送给林语堂。

1961年是曹雪芹逝世198年忌日,台湾把乾隆“甲戌本”影印了五百套,胡适写了很长的题跋,还检讨了“差一点儿失之交臂”的错误,“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不会到我手里,就很可能被永远埋没”。为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根据台湾影印本影印出版。书中加了“说明”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通称乾隆甲戌脂评本,是研究《红楼梦》重要资料。其原抄本于解放前为胡适所窃据,去年五月台湾据以影印出版,因此书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所需,我所特加以复制,去尽胡适涂抹痕迹,个别缺字间加移补,按原装分为四册,俾恢复其本来面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五月”。我曾经购得一套,至今插于架中。

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红学界搞得很热闹,文汇报驻京记者吴闻、刘群访问了周汝昌,以“本报驻京记者吴柳”之名发表了《京华何处大观园》,记述了北京红学界寻找大观园的情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影印乾隆“甲戌本”,是内部供应。我持有“内部购书证”,到福州路、河南路路口的新华书店“内部供应柜”为杜春堂谢稚柳、来燕榭黄裳各买了一部。

由于好奇心,我一直想知道胡适在乾隆“甲戌本”上到底“涂抹”了什么样的文字?1980年,听说从碧老人张伯驹手中有台湾原装影印的乾隆“甲戌本”,我即携带所藏影印本去了北京,想将中



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删去的“胡适涂抹”的文字作一誊录。到了北京,还没去丛碧老人处,又奉召回沪。1980年,首届国际《红楼梦》讨论会在美国举行,胡适藏乾隆“甲戌本”在会上展出。中国应邀参加的几位红学专家对此本也只是看了几眼,未能翻阅。胡适藏甲戌本《脂砚斋石头记》原藏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现藏何处?不只是我,就连中国红学界对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可谓望穿秋水。

(下转7版)